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2.3

「觀看」Tahrir

Samia Mehrez

ISA論壇在 Buenos Aires

Alberto Bialakowsky
and Alicia Palermo

波蘭移民

Ewa Palenga-Möllenbeck

全球社會學辯論

Jeffrey C. Alexander
Paulo Henrique Martins

- > 令人失望的後蘇維埃社會學
- > 紐西蘭的毛利社會學
- > 後蘇維埃的亞美尼亞新貧
- > Current Sociology的歷史
- > 日本編輯團隊介紹
- > 全球化教室
- > ISA的選舉不公
- > 紀念：John Rex和Kurt Jonassohn
- > 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哥倫比亞、土耳其國家、印度、金磚四國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二卷 / 第三期 / 2012.02

GDIN

eniu z Nie
agnął wy
pnia dob



ską Górny
aczną ne

> 主編的話

社會正義與民主化

Buenos Aires對於即將登場的ISA論壇—社會正義與民主化—來說是一個特別適合的地點。如同Alberto Bi-lakowsky、當地組織委員會會長Alicia Palermoand，以及拉美社會學會會長Henrique Martins在本期全球對話中所說的，拉美不僅孕育了追求正義與民主的社會運動，社會學家在這之中也扮演了如英雄般的角色。如此一來，它們有了相當獨特的地方社會學，這點我們將在論壇中看到。

「社會正義與民主化」這個主題暨合理又符合歷史氛圍。Samia Mehrez 的首篇文章就是對於埃及「一月革命」的一週年回顧反思，對該其多元的意義進行討論。的確，開羅的Tahrir已經引起了長達一年的全球革命浪潮。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地在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葉門等地展開，並激起了歐洲對於財政緊縮的抗議運動，還有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我們也不該忘記在以色列、智利、俄國的群眾抗議。這些或許是國家內部所挑起的憤怒，不過其運動的精神卻是全球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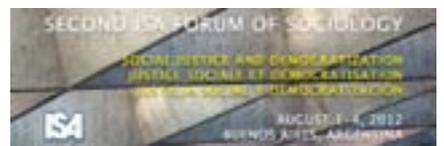
我們並沒有太多被剝削者的運動。雖然他們已經加入，可是仍然被逐出。其存在的意義正式因為其相當罕見。這些通常都是學生、或是之前是學生，也就是廣義的年輕人所發起的運動，他們的未來被犧牲了，喪失可以應用所學的機會。此外還包括失去土地與水源的農民所發起的運動，在中國、印度、菲律賓、巴西、波利維亞和其他地方皆可看見。佔領運動也反對都市圈地，與那些霸佔原本應該是公共領域的警察對抗。

當佔領華爾街運動象徵性的挑戰資本主義時，他們也實際地挑戰著社會學。不平等研究不能再如以往限制在99%的人身上，還要更關注1%的那群人。我們不能只看收入，而是還要研究財富以及1%的人如何剝削99%。政治社會學也不僅只能研究選舉民主，因為其無力反對社會正義，也對管制金融資本束手無策。佔領運動已經以參與民主的方式定義了自己。這點，拉丁美洲是先行者。1990年代的結構性經濟瓦解導致了十多年的反對運動，例如阿根廷佔領工廠和公共場所的運動。這也是為什麼Buenos Aires是舉辦論壇恰當地方的另一個原因。

全球對話每年以13種語言發行5期。讀者可以在[Facebook](#)以及[ISA website](#)閱讀全文。稿件請寄給Michael Burawoy：burawoy@berkeley.edu。



觀看Tarir：埃及1月25日的革命激起了全球抗議浪潮。正值週年時Samia Mehrez思考其在埃及和其他地方的多元的意義。



Buenos Aires的ISA論壇的挑戰：在地組織委員會的Alberto Bi-lakowsky和Alicia Palermo告訴我們他們規劃如何辦這場全球性的正義與民主的討論。



波蘭移民：蘇聯的解體產生許多中東歐的新移民，反映了地方發展的不均等。Ewa Palenga-Möllenberg討論了德國的波蘭移民。



在地國際主義：Jeffrey C. Alexander延續全球社會學的辯論，說明在地與全球如何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sht, Fatemeh Moghaddasi, Saghar Bozorgi, Jalal Karimian.

日本: 西原和久, 芝真里, 塩谷芳也, 姬野宏輔, 高見具広, 池田和弘, 岩館豊, 福田雄, 三部倫子, 佐藤崇子.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Anna Piekutowska,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Tomasz Piątek, Julia Legat, Mikołaj Niziński,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Patrycja Pendrakowska, Wojtek Perchuć, Adam Mueller.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Elena Nikofova, Asja Voronkova.

台灣: 何經懋

烏克蘭: Svitlana Khutka.

媒體顧問: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社會正義與民主化 2

> 跨國轉譯

「觀看」Tahrir
by Samia Mehrez, 埃及 4

Buenos Aires的ISA論壇的挑戰
by Alberto L. Bialakowsky and Alicia I. Palermo, 阿根廷 6

波蘭移民
by Ewa Palenga-Möllnbeck, 德國 8

> 辯論：不平等世界的社會學

在地國際主義
by Jeffrey C. Alexander, 美國 10

拉丁美洲：宿命的社群？
by Paulo Henrique Martins, 巴西 12

> 區域

令人失望的後蘇維埃社會學
by Victor Vakhshayn, 俄羅斯 14

紐西蘭的毛利社會學
by Tracey McIntosh, 紐西蘭 16

後共產亞美尼亞的新貧現象
by Gevorg Poghosyan, 亞美尼亞 17

> 特集

歷史一隅：Current Sociology的歷史
by Jennifer Platt, UK, and Eloísa Martín, 巴西 18

社會學教學：全球教室
by Larissa Titarenko, Belarus, and Craig B. Little, 美國 20

ISA的政治：對國家學會的不平等待遇
by Roberto Cipriani, 義大利 22

編輯介紹：日本團隊 23

> 紀念

John Rex過世，享年86歲
by Sally Tomlinson and Robert Moore, 英國 24

Kurt Jonassohn，1920-2011
by Céline Saint-Pierre, 加拿大 25

> 會議

哥倫比亞社會學的承襲與斷裂
by Patricia Jaramillo Guerra with Fernando Cubides, 哥倫比亞 26

歐亞的土耳其社會學
by Elena Zdravomyslova, 俄羅斯 28

印度社會學會的60週年大會
by T. K. Oommen, 印度 30

磚四國的社會階層
by Tom Dwyer, 巴西 32

> 「觀看」 Tahrir

by Samia Mehrez,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埃及

Samia Mehrez在AUC的阿拉伯與伊斯蘭文明系任教，是阿拉伯文學的特聘教授，同時也是翻譯研究中心的主任。我最近在開羅和她碰過一次面，知道她正準備發表新著作，是一本對於Tahrir革命有著非常精彩敘事的書，相當令人振奮！因此我邀請她為本期的全球對話寫了這篇文章。--Michael Burawoy



這篇文章要發表的時候，大概也是Tahrir革命剛滿一週年不久。發生於去年的1月25日的這場革命運動最後逼迫了總統Mubarak於2月11日下台。這個運動開啟了許多可能性，特別是埃及自身，埃及於區域中的角色，以及埃及在全球的位置。這場1月革命帶來了豐富的論述資源—在thawra (革命)和inqilab (政變)中不斷來回辯證，並且迄今還是對於埃及人所關心的單一事物的命名與框架，抱持著非常反對與抵抗的態度。不過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

定的：從1月25日和接下來的十八天，Tahrir廣場(包括了暴力衝突、示威遊行、靜坐等)為埃及的歷史開啟了嶄新的一頁，也成為了埃及的象徵地：代表著持續不斷的反對運動浪潮。這股運動浪潮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持續改變著埃及社會。

1月25日之後的一段時間，因為廣場上死傷與被逮捕的人數越來越多，許多人很擔心它會變成一座「展覽館」，僅僅展示著自己。他們所害怕的，毋寧是如我同事Amr Shalakany所說的「那不過就是一個可以

在Tahrir廣場的大旗幟標示著1月25日革命的週年。上面的人分別是Hussein Tantawi (左)，前總統Hosni Mubarak (中)和前內閣Habib al-Adly。下面寫著：「民主」。Mona Abaza攝。



Samira Ibrahim於12月在開羅的一場遊行中比出勝利手示，代表女權的伸張，因為她成功的控告軍方不當對女囚進行處女檢驗。

要性。持續不斷上演的暴力事件，以及隱微的暴力恫嚇(將運動者毆打、電擊、傷殘，對女性運動者檢查貞操，軍事審問，殺害，突襲媒體或NGO，攻擊或逮捕外國記者，選舉作票，侵犯女性等等)，也因此都被社會媒體或私人衛星所傳播開來。

持續不斷的暴力事件徹底損害了起初人民和軍隊之間的浪漫關係。但越來越多的埃及人知道革命不會只在這裡上演，還會在全球各地的其他地方發生，轉譯著Tahrir展示場的精神：人民要求政府垮台！(al-sha 'b yurid isqat al-nidham) ■

讓人們觀看革命的地方，你來瞧一眼，晃一下，然後就回家了，或是回到地球的另外一邊。」沒錯，人們的確是來Tahrir廣場「觀看」革命，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在家看電視或上網看而已。但是，我要說的是：有過這樣的「觀看」，觀眾變成了積極的參與者，共同參與了這座展場、這個「觀看」的轉變—革命性的轉變，形塑了新的歷史主體。

在這個脈絡下，「展示場」的功用不在於取代政治活動，而是一種革命性動員和激進化的模式。的確，一波接著一波的運動和「展示場」，不論是和平或是暴力的事件，都被大眾記錄、傳播、流通開來，產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埃及人因此發展出了一種新的空間關係(不論公或私、真實或虛擬)，也得到了新的對於身體的擁有權和權力，開始要行使自身的權利，講出自己的語言(不論是口說或寫作)。

Mubarak專政達30年之久，控制著埃及的公、私領域，政府，以及公共文化，其政權在1月底之後也被軍事政權再生產著。這個政權是因為緊急法律的強制執行，合法化拘留和刑求，並對言論自由嚴加審查。不過這一切都未能阻止大眾革命運動的發生。

多個埃及革命展示場的出現

象徵著獨裁政權的搖搖欲墜，也開啟了埃及自由時代的歷史性一刻。埃及人努力爭取自己的自由權利，奮力保衛自己的身體、空間、語言的主導權。而這些很有創意的政治社會運動也感染了世界尚其它的國家。這些展示場中，其中一個發生在過年前夕，也是廣場歷史性的一刻，它把埃及人民整個動員起來。這場革命一直持續著，儘管付出了流血的代價，以及Mubarak的新黨羽：Muslim Brotherhood和Salafis也一起要威脅、削弱人民的運動。的確，有「展示場」，就有由政府 and 軍事法院所派出干擾的「反展示場」。

在一開始，埃及革命的展示場利用、激進化、並徹底轉變了傳統mulid的儀式—對於跨越埃及階級之全國性的精神人物所慶祝的生日儀式。在過去的一年內，Tahrir成為了mulid儀式的一部份。這樣一個儀式性、嘉年華的模式，帶來了所謂「Tahrir獨立共和國」的誕生。這毫無疑問是個展示場，把上百萬的埃及人帶到街頭來一起參與革命。其中之一觀看廣場的最革命性的結果，是在於透過瞭解到Tahrir(解放)並不只是一個實體的空間而已，而更是集體的狀態與意識，而埃及人的基本訴求：ish, Huriya, 'adala igtima 'iya(麵包，自由，正義)並因此繼續發揮重

> Buenos Aires論壇 的挑戰：

用平等的社會學挑戰不平等的 世界

by Alberto L. Bialakowsky和Alicia I. Palermo, 在地委員會會長和副會長, ISA 論壇, Buenos Aires, 阿根廷, 2012

ISA論壇將於8月1-4日在Buenos Aires舉行，準備工作也已經展開。整個過程—從選擇在Buenos Aires落腳—代表了全球性的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知識交換即將在這個城市發生。這或許是近10年內在拉丁美洲所舉行的最重要的會議。無疑地，拉丁美洲的知識實力正如其文學傳統一樣，相當有名，但是在扮演一個集體批判轉型的角色上，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這個會議也將會成為拉丁美洲學習與建立內部對話的機會，也讓世界北方或南方有機會一起面對社會科學的挑戰。

有三點我想要強調。第一，大會主題是「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第二，討論科學知識生產和社會轉型下我們這個學科所扮演的角色；第三，論壇本身的智識結構是一個或許常被忽略、但是卻很重要的面向。

關於第一點，將主題與徵稿放在一起通常就要去審視專長和次領域，但是也包括

了跨領域的問題。複雜度的典範使我們更容易可以找到多元的觀點，也允許我們去克服各種二分法，像是巨觀和微觀，單一學科和跨學科等。這樣一來，我們可以處理各個層次的問題，並從各種角度出發，深化單一領域的知識，並做跨領域的結合。因此，社會正義和民主化將會出現在各個不同的次領域中，也會超出學科界線之外，產生出意義。

社會學的歷史充滿了對正義和不平等的評價。某些理論的角度傾向保持現狀，某些則支持社會轉型。將權力擺在社會學中心有助於我們去消弭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易言之，所有的社會學都必須承擔各種烏托邦或是生命政治的實踐，因為這些是研究的動機所在，並遍佈在社會學理論、應用、分析，以及知識的轉變之中。

在當代全球化的社會裡，系統性危機所帶來的痛苦，不斷地要求我們要用新的知識去正視不論是在一個社會

內部或是跨國社會的不正義。全球人權議題爭辯的再次浮現帶來了兩個重要的主題：一方面，科學知識進程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上述兩者對於社會平等的影響。這兩個面向都和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以及我們對於地球動態的瞭解有關。任何企圖想要控制這兩者關係的努力都反映出了實證主義和啟蒙的優越感，因此也都遭受到質疑。這樣的說法源自於法蘭克福學派，而最近則由拉美「批判與去殖民化思想」的作者群所提出。科學進展並不同於社會正義或民主參與。打個比喻來說，社會的基本構造就是堅持使用奴隸制度，貧窮、種族或族群隔離，性別、大屠殺、生態號浩劫等。

所以顯而易見的是，民主化不是只發生在社會的層次，還會出現在社會之間，社會與自然之間，甚至是不同的學科之間。不過，生態本位主義、人類本位

>>

主義，以及其他各種不同的霸權思想，也不只有出現在研究之中，它們也都在知識研究建構的過程中可以看見蹤影。若參考「從拉美新的依賴而來的激進認識論批判」，會發現Sujata Patel (2010) 這樣說道：「如Aníbal Quijano, Enrique Dussel, 和 Walter Mignolo都已經闡述過這個立場，認為社會學理論的普遍化是知識的地緣政治之一部分。這個過程的關鍵是去審視現代性及其和社會理論的關係。」

換句話說，這不只是在不同學科裡面去做研究的問題而已，更重要的是認識論的不對稱性和霸權的理論化性格。新理論潮流的對話方式拒絕了根植於現代性典範下的不對稱性，認為這些對立可以被克服。這樣的經驗我們可以用非洲學者的話來說明：「奈及利亞的社會學歷經了許多困難的階段。現在我們所面臨的難題是：我們要做的不只是解釋我們在地方的社會、找出原因、找出社會結構的衝突點，我們還需要能動性去把這些社會過程都拋棄。為了此一目的，我們需要典範的轉移。」(Onyeonuru, 2010: 280)

不論如何，我們相信這樣的思考方式都代表著我們真的是需要新的典範去建立新的「知識生態」(De Sousa Santos, 2010)。在連續危機的這個脈絡下，社會學可以提供對於跨國之間的認識有幫助之批判性的研究。不過這不代表我們自己就不需要反

“近幾十年來在拉美最重要的會議”

省，或是就不期待以全球的角度去討論事情。

為了反對社會不平等和快速變遷的社會，在解釋社會和轉變的方面，社會學家有很多任務在身。全球性危機對於社會各個面向的影響一直在增加當中。像是全球北方或南方，我們就可以支持那些奮力掙扎的社會組織提供支援。

如此一來也促使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ISA論壇準備好去面對這樣的挑戰了嗎？無疑地作為一個特殊的結構，答案是肯定的。的確，論壇作為對話的場所，就是希望激盪大家的思考，深化辯論的內容。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研討會和場地—我們將會透過創意性的思考對全球的社會分析做出貢獻。事實上，這將形成一個批判和反身性的社群，並產生普遍性的知識—這種知識是集體的、也是公共的。

我們承諾會帶來熱情友好的氛圍。此外，我們也希望在各個場次一個綜合性的辯論，邀請研究委員會、工作與主題小組參與。■

References

De Sousa Santos, B. (2010) *Para descolonizar Occidente. Más allá del pensamiento abismal*. Buenos Aires: CLACSO-Prometeo-UBA.

Onyeonuru, I. P. (2010) “Challenges of Doing Sociology in a Globalizing South: Between Indigenization and Emergent Structures” Pp.268-281 in Michael Burawoy, Chang Mau-kuei, and Michelle Fei-yu Hsieh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 (Volume 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d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atel, S. (2010) “The Imperative and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Reconstructing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in an Unequal World” Pp.48-60 in Michael Burawoy, Chang Mau-kuei, and Michelle Fei-yu Hsieh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 (Volume 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d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波蘭移民： 跨國者或是客工

by Ewa Palenga-Möllenbeck,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德國



從1990年代起，移民研究出現了新的研究方法。從前古典的研究將移民視為是一個一生只會出現一次的事件，並且移民者最終會融入到移民社會中，或是永遠返回母國；現在，研究者開始研究跨國遷徙者如何和多個不同的社會保持連帶。這個方法發展於北美移民的經驗上，不過在歐洲也可以找到類似的遷徙模式。例子是Upper Silesia的移民。該地現在是位於波蘭，不過在二次戰前是德國和波蘭的邊界。

由於*ius sanguinis* 是德國公民法律的基本原則，該地的居民不論和德國有多少程度的社會連帶，一律都具有德國公民身份，並且不用放棄原本的波蘭籍。許多具有雙重國籍的人就藉著這個法律漏洞到德國找工作。因為在2011年以前，德國的勞動力市場是不對波蘭人開放的。固然有許多Silesia的居民已經永遠定居在德國，不過

Upper Silesia和德國的密切關係有著長久的歷史因素。在這張一次戰後的圖片中，Upper Silesia被描繪為在波蘭(貧窮女性抱著嬰兒)和德國(繁榮的工廠和鄉村住宅)之間的拉扯關係。現在許多人居民認為被這兩個地方牽絆住了。原圖保存在英國London的Imperial War Museum。

>>

還是有數十萬人保有波蘭的永久拘留權，並通勤到德國工作。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可以擁有比較好的生活水準。

這個個案中的雙重國籍者說明了並非只要擁有法律上的特權的人就算是跨國遷徙者。大多數人都是處在移動的生活方式中，但這也不意味者他們就是雙腳分別踏在不同國家土地上的跨國者。就像我們觀察到有一類移民總是在移動，可是只會和母國保持社會關係。這個事實有點令人驚訝。因為，畢竟他們是有理由成為跨國者的，因為他們會雙語或是移民傳統等的文化因素、法律身份，以及移民身份相關的工作等等。

可是現實永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一方面，那些擁有雙重國籍者，不論在德國或在波蘭都可以找到不錯的工作，這也使得他們成為「融入德國的非移民」。另外一方面，也是

因為波蘭的高度安全鼓勵他們多移民，但卻讓他們不想和移民國建立永久連帶。因此，結果就有兩種，一種是保持兩個身份，另外一種就是成為非法移民。後者被迫要融入於德國社會以避免被遣返和逮捕，但是又由於不會德語和不瞭解德國社會，所以只好高度依賴其各自的移民公司。一位移民公司的主管這樣說：「他們知道有人會照顧他，他們只想工作，想賺錢，如此而已。他們只想讓自己好像擁有德國護照，賺錢、工作，就這樣。」

這裡所描述的雙重國籍者，其實比較像50年代很容易就可以進入德國的波蘭客工，反而不是那種聰明到可以在兩國分別周遊斡旋的移民。不過這種資源豐富的移民在Silesia也看得到，他們會雙語，擁有專業技能、文化資本。但是什麼因素造成這兩種移民的呢？答案肯定相當

複雜，我想在這邊是沒有辦法可以詳細討論的。一個可信的因素是「客工生活方式」存在於跨國移民的產業之中，這些產業提供了很多工作機會給移民，不過也同時讓這些人距離移民國越來越遠，始終無法融入。 ■

> 在地國際主義

by Jeffrey C. Alexander, Yale University, 美國, 前ISA社會理論研究委員會主席(RC16), 2010 ISA Mattei Dogan Foundation Prize得主



這裡是兩張自然風景的美學再現。一張是中國的畫作，另一張是美國的。他們都不是所謂的本土創作，可是都兼具了國際和在地的元素與風格。換句話說，藝術從來不是自然的客觀再現，如同社會學也不可能客觀地再現社會。

Piotr Sztompka和Michael Burawoy之間的這場遲來的辯論相當有意義。兩位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理論家，其之間的對話不但重要，且彼此針鋒相對，充滿矛盾。我想這並非是因為他們的概念和想法非常新穎出色；相反地，他們之間的矛盾反應了社會科學思想的悠久歷史演進。當然，這個議題會持續存在著，我們也必須定期地更新和釐清我們的想法。

社會學嚮往著理性、普世主義、以及普遍性。然而，雖然說這些理想代表著自然科學的成就，但是這不代表社會科學也非得達到這樣的

目標不可。這個道理在一百年前Wilhelm Dilthey就告訴我們了。社會學就像藝術一樣，是一種生命經驗的在地反思結果。值得一提的是，這麼說並不意味著社會學就只是完全在地化的思考而已。

重要藝術作品的風格總是被某重美學傳統所形塑，而且這個傳統可以超越某種地方主義的形式。地方主義則提供了作者表達思考的方式。在中國，這種外部風格來自於所謂的古典傳統。在19世紀的西方，正值現代主義興起時，地方的歐洲畫家不斷地參考他們口中所謂的現代主義。那些想要創立自己國家最前衛藝術風格的藝術

家，則努力想要連結在地風格和以巴黎為中心的外部國家美學，並且讓那些地方性的作品可以持續地留在巴黎這樣的大都市內。

社會學也不例外。如同藝術，所有的社會學都是在地地的，因為社會學在做的無非就是去理解在特殊時空條件下的某個社會經驗。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皆然。每個地方都不一樣，而這樣的差異代表著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社會經驗本來就不盡相同，也因此決定了到底什麼才是社會學想要知道的。

從不同國家的社會學中我們可以開拓視野，讓我們知道什麼是一個國家最需要被解釋的問題、權力鬥爭、或是文化意義。我們之所以可以學習其他人的經驗，是因為這些作品被翻譯成特定一些相對多數人在用的語言，在會議上發表，或是發表成為文章。正是這樣跨越地域的翻譯，才使得知識的累積得以可能。

然而，將在地地的社會學觀察轉變成特定時空下的經驗成果這點上來說，社會學並不會比藝術來得容易達成。地方社會學很難只是地方的，因為地方總是被其它的地方和全球性的因素所影響，像是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智識或是宗教等的因素都持續不斷地在形塑地方或民族的認同。當然，我們有中國社會學，有台灣社會學，也有韓國、日本等其他國家的社會學，它們都各自代表著獨特的知識傳統，這一點不能否認；可是，它們各自也

難只是地方性的產物而已。地方社會學的出現其實也包括了全球學術機構的訓練，使它們可以從去中心化的角度去關照在地的社會經驗。

正是這樣的「在地國際主義」使得社會學家採用超越個人、地方機構及情境的標準去評斷社會學研究的有效性。若我們說世界上每一位社會學家都有這樣理性的期待，並不為過。因為，沒有人會因為其同事只是因為其作品可以處理在地的問題就可以宣稱其有效性，更不可能會因為同事跟他們是同一國族的人，像是非洲、印度、美國、中國等，就做出如此的宣稱。社會學只能是反身性的，否則，其就什麼都不是了。

藝術也是如此。19世紀的美國藝術和歐洲潮流完全不相干。其自視甚高卻相當狹隘，從現在的眼光看來就是國家的藝術或是很簡單的藝術而已。到了19世紀末，一些比較有抱負的藝術家到歐洲，特別是巴黎，然後在20世紀的前半葉，美國的在地世界主義藝術家生產了許多很承襲自法國的優秀作品。只有在二次戰後，美國才擁有自己的藝術傳統，因為美國已經成為強國，世界歷史圍繞著美國而展開。所謂的「紐約派」風格開始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流行。然而，即使紐約是個地理意義上而言的「地方」，可是抽象表現主義很難被視為是美國在地傳統的產物。事實上，其代表的是歐洲現代主義的延伸，而在更早之前，這則是批

判性地結合了日本、非洲、前哥倫比亞原住民等的風格傳統。

社會學也將會這樣發展下去。其實我們很幸運可以生活在現在這個時代——一個500年來第一次可以有機會挑戰西方現代性社會的時代。這樣的多重現代性也終於可以挑戰不僅是軍事強權的西方，也可以質疑西方霸權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當這些不論是來自中國、印度、韓國、南非、俄國等的思想家一旦卸下它們理論或方法論的盔甲時，他們將不在僅僅是地方性的思想家了。他們的作品將會是這個長期智識全球化下的產物。

普遍性的社會學並不會來自於地方。不論是社會學或是藝術都沒有所謂的純粹地方的這種東西存在。他們同時不是在地，卻也都是在地。■

> 拉丁美洲： 命運的共同體？

by Paulo Henrique Martins, Federal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 巴西, 拉美社會學會會長

全球化為知識生產體系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式，藉此得以挑戰長期以來以歐洲為中心的知識分工體系，並且進一步反思現代性的內涵。對於像是Arjun Appadurai等的學者來說，「第三世界」已經不再是北方國家的資料庫了，同時，北方也失去了輸出知識到南方的特權。在這個意義之下，全球化成為一個特殊的場域，這個複雜的地理過程，跨越國族疆界，同時國族也做為知識生產的單位，讓社會學知識的建構得以可能。

讓我們想想拉美的這個特殊的例子。知識的全球化對於社會學認識論傳統的改變，有著很大的貢獻。在1940-1980年之間，也是所謂的第一階段，批判思想的出現取決於全球化如何以經濟或政治依賴的方式被再現。我們在兩種主要的思想中可以印



證這一點。第一個是結構主義，其被拉美與加勒比經濟委員會(CEPAL)所啟發。該組織在1948年成立，目的在思考拉美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

兩位經濟學家：阿根廷的Raúl Prebisch和巴西的Celso Furtado。他們認為國家對於經濟發展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當全球貿易制度對於原料輸出

國有相當大危害的時候，更是如此。CEPAL把核心一邊陲的架構帶進發展理論。第二個思想則是依賴理論，由Theotonio dos Santos、R. M. Marini、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Enzo Faletto等人所開展，延伸CEPAL的核心一邊陲架構到政治領域的分析，認為克服依賴體系必須有賴於國際的階級團結。

而從80年代至今的這段期間，社會學整合了許多不同的全球化理論。一方面有理論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可以消除國家的疆界，讓民族國家退位，全世界成為貿易、制度等的一個整體。這個由抽象經濟理論而來的觀點忽視了不同國家的政治、文化差異。對於新自由主義來說，依賴理論早就過時了。而另一方面，有後依賴理論認為依賴體系其實是後殖民體系，特別是權力與知識這點上，與傳統的富裕與貧窮的概念不同。殖民理論家認識到了我們不可能無視於政治文化的差異而一味地借用歐洲的理論。這個第二期的拉美後殖民理論辨識出了殖民與反殖民之間的

“依賴關係已經被重構為『殖民性』了”

歷史衝突，並且也認識到了一種全球化的新宰制方式。

拉美的後殖民理論並非將殖民與反殖民視為是西方國家的歷史遺產。對他們來說，這些理論的表達方式只是認知和語言學上的策略，也就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和其他人所稱的「接觸域」，用來認識世界體系中不同的經驗與概念。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在全球化鏡像中的兩個表面上產生作用，中介、翻譯南北之間的資訊、圖像和概念。對於這些學者來說，全球化包括了在全球論壇和運動中、發表中、以及全球性組織(如ISA或ALAS)等複雜的翻譯過程。在這個脈絡下，社會生活中的政治、道德、美學、倫理、語言等的元素得以興盛茁壯，並且逐漸使得知識轉換的模式得以進步。其中的學者如Casa-

nova、Quijano、Lander，甚至是北方的Immanuel Wallerstein都表示過這個新的殖民主義理論立足點很穩固。

最後，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後殖民社會已經不再像以前被單一的政治文化歷史過程所形塑。我們的確可提出社會學的特別期待：這個區域有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可能。透過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知道「拉丁美洲」這樣的表達方式在象徵層次上是不適合的，因為這不過代表了一種語言意義的共同體：「Latino」，這排除了其他在歷史上相當重要的原住民，黑人，歐洲的移民，或是亞洲人。對於拉美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理解，必須是一個烏托邦，而這個烏托邦擁有力量去刺激學術知識上的交流，讓這個地區內彼此結合得更緊密。 ■

> 令人失望的 後蘇維埃社會學

by Victor Vakhshayn, Moscow Schoo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俄羅斯



2008年全蘇維埃社會學大會

過去幾年來俄羅斯的知識界充滿火藥味。其中主要有三篇文章引起熱烈辯論，其中的兩篇是討論社會學本身，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學的社會學」。這個主題雖然不是學界主流，但卻是公眾最感興趣的議題之一。在俄羅斯的社會科學界，研究共產主義的垮台或是轉型，已經不再是唯一具有正當性的基本問題了。

既然後共產主義下社會學的萌芽期已經結束，那麼皆下來的就是具有高度反身性的社會學出現了。

> 新蘇維埃語言

回顧一下在這個辯論之前的社會學語言，對於我們理解這次辯論是有用的。2008的俄羅斯社會學大會或許是個不錯的起點。這場大會具體

做出了許多空洞無意義的宣稱，像是「因為社會持續的發展，我們必須要提供更高品質的社會學研究」，或是「現今的社會學任務是要面對來自社會不論是經濟、心理、能量、等其他層面的安全需要」。若我們看一下2500位與會者的問卷資料，有73%在擁有字典的情況下而熟悉一種外語的；40%的人在政府或是類似的商業機構

>>

工作；66%會閱讀主要期刊Socis；最受歡迎的書籍是由V. Dobren'kov和A. Kravchenko所編的；而最受歡迎的外國社會學者則是Zygmunt Bauman和Piotr Sztompka。

此外，若被問到社會學的定义為何，最多人的回答是，「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被問到什麼是社會，多數人沒有回答，而在有回答的之中，最多人說社會是「socium」。如此套套邏輯的答案，其實正反映著這樣一種保守的社會工程式語意：社會對國家來說是有用的。若非得需要理論不可，那則必須是俄羅斯的理論，處理這個國家相關的議題。這場大會也不歡迎某些「自由派社會學家」，也就是那些領西方國家薪水、意圖煽動橙色革命的學者。總之，這場會議展現了一種穩固的新蘇維埃社會學語言正在形成中，這對於幫助我們理解和分享什麼叫做套套邏輯，相當有用。

> 反蘇維埃語言

現在讓我們看看反面。這裡我們一定要提及Russian Pathways這場會議。這是18年來最出色的定期會議。從他出版的刊物(1993-2008)我們會發現他的反蘇維埃語言是如何形成和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因此，我們先來看「轉型」(transformation)這個字如何從概念演變成隱喻，到最後可以解釋任何事情。它就像新蘇維埃的語彙一樣，有其公理式的宣稱，而且不需要任何的理由。首先，反蘇維埃語言對於蘇維埃社會學和新蘇維埃非常批判；再者，它很明白的認為社會學應該為解放、民主、公民社會而服務。另外，其非常強調經驗研究，要求以sociography的方式去找出俄羅斯社會

的根本問題所在。他們不斷重複強調「社會根本問題」的字眼，其實根本上違背了最基本的實在主義的看法，不把社會當作一個客觀的存在，而將許多既定的研究議程加諸在研究者身上。像是伽利略一樣預設Book of Nature必須以數學的形式加以寫作，反蘇維埃學派認為社會應該以社會學--他們自己所認可的社會學--的形式表達。

Russian Pathways的語意在過去15年間並非一成不變。在1990年代的一場辯論俄羅斯未來的事件之後，他們已經失去激進的立場，而此自由派的角度批判政府。雖然表面上的修辭有所改變，然而實際的意義還是一樣，從以前的「這不應該是如此」，到90年代的「這不應該還是如此」，一直到「這完全不應該如此」。

> 後蘇維埃聚合

正如套套邏輯是新蘇維埃的主要精神，悖論則是反蘇維埃的底蘊(強調實然和應然的差距)。我要論證的則是，這兩者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因為他們都是「蘇維埃式」的語彙。

1. 懷疑的文化：兩種論述有著同樣的預設：「政治利益先於知識。」你所說的並非你實際所想的，而語言則反映出了你的政治立場。所以，任何的理論價值取決於目的是否達成。

2. 實踐：新蘇維埃社會學認為知識要為國家的利益服務，所以他們以一種社會工程的角度去從事研究；反蘇維埃學派雖然不認為學術要為國家服務，但是也要為某種目的而服務，那就是「進步」。在這之中我們看不到所謂的「為了知識而知識」這種東西，或是Weber所謂的為

了科學而科學的主張。兩者都認為知識要為了某種目標才得以存在。

3. 理論民族主義：禁止任何外國的理論進口到本國來，除非本來就根植於我們的土壤之中。土壤一詞，其實來自於第三屆的社會學大會。Russia Pathways則有自己的另一套隱喻：「故鄉的楊樹」。總之，反對外來理論是兩者的最大公約數。

4. 沒有反身性：不過幾年前，保守派和自由派齊聲反對方法論的反身性。他們眼中認為這是後現代的偏差，從實在主義的研究綱領中走偏了。而現在兩派都在反身性中掙扎打滾，過度的反應反而讓俄羅斯社會學停滯不前。

很顯然地，上述兩者並沒有辦法涵蓋俄羅斯社會學的全貌。其他當然還有，不過其實和主流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也不會超出莫斯科Beltline (像是聖彼得堡)太遠。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會分析、現象學、民族誌等方法都在努力爭取科學的興趣時，俄羅斯兩派的鬥爭讓社會學淪為是政治的傳聲筒而已。

> 紐西蘭的毛利社會學

by Tracey McIntosh,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紐西蘭

紐西蘭是一個殖民政府，必須持續不斷地面對過去的殖民歷史。這意味著，紐西蘭的社會學必須處理並回應特權與弱勢之間的再生產，因為這就是原住民(毛利人)和非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我作為一個對於毛利人有特別關注與興趣的社會學者，我相信我們可以藉著提出一個整合社會正義的研究綱領，對這個跨領域的研究做出貢獻。毛利社會學相對而言是少數，不過有越來越多的非原住民投身到毛利社會學的研究之中。

毛利人被剝削、殖民、邊緣化的歷史，意味著毛利的族群認同本身就是一個鬥爭的場域。作為 tangata whenua (島嶼主人，原住民)，毛利人及其社會關係向來引起很大爭論。在社會負面的各個指標都被過度放大的情況下，毛利人總是必須爭辯政治和人民的修辭，這些修辭誇大了他們的因為身為原住民而特有的成就。毛利人的政治鬥爭也試圖去彌補過去(通常是近期的過去)那些土地和資源被剝削的不正義。而成功的經驗也代表著他們的生活已經徹底被政治化和放大詳細檢查。

毛利人和非毛利人之間的不平等是顯而易見的。研究已經證實毛利人其實同時遭受到雙重的不平等對待。毛利新生兒的死亡率高於非毛利人。毛利幼童也比較難取得學前教育資源。毛利學生的輟學率較高，因此學業成就也較低，犯罪率較高。此外，失業率也明顯高出其他人，並且收入遠低於非毛利人。毛利人也比較容易取得政府的福利補助，多數人住在品質低劣的地方，身心健康條件極差。另外在刑事法律上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不論作為受害者或加害者都高於其他族群，佔了全國人口的50% (他們總人口比例不過15%)。有太多太多的毛利人失業、病痛、心理疾病、貧窮、入獄。雖然說他們的地位和合法性從1970年代以來成長了很多，在文化和語言上也逐漸被平等看待，不過相較其他的的不平等，毛利人並稱不上是成功的。

社會學其實可以在這樣的議題上扮演很出色的角色。社會學研究有威力的地方就在於從多元的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廣泛傳播下得以發揮。不過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忽略權力的議題。所有的研究都被權利

的動態關係所形塑。從研究過程的一開始，投資、設計、參與、實做，以及推廣，權力都是無所不在的。然而，聚焦在社會正義的研究成果將可以凸顯研究者和參與者在過程中會遇到的諸多困難與機會。

總之，我想要特別強調以毛利人為中心的跨文化議題。現在，相關的研究都是由毛利人所主導，不過，非毛利人若能跳出傳統研究的藩籬，願意進入毛利文化的脈絡中，他們一定可以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至今毛利族群仍未從主流學術研究中獲益，因為主流的研究視角有所偏差。現在同樣的社群認識到了跨文化研究可以帶給他們好處，但仍然宣布毛利研究只對毛利族群有益。受壓迫群體必須學習並認識壓迫者的文化與生活方式，以期待可以擺脫自身受壓迫的處境與地位。藉由跨族群合作，我們可以教育非原住民群體關於原住民的種種，但是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教非原住民重新認識他們自己作為壓迫者的這個事實。



> 後蘇維埃亞美尼亞的新貧現象

by Gevorg Poghosyan,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Law of the Armen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亞美尼亞社會學會會長

隨著共產政權的解體，20世紀末的社會轉型開啟了新的歷史扉頁。在這個社會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後共產主義國家歷經並面臨了發展上的困難。所謂的「現代性的反彈」以及去工業化的結果，是這些國家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在這現代化的過程中把族群文化的因素排除掉了。

在亞美尼亞，現代性的反彈帶來了極度的去工業化，使得國家的經濟，特別是農業，回到古代一般(Poghosyan 2005)。後共產的私有化產生的結果是財富集中在極少數的資本家手中，並製造出一批貧窮且未發展的中產階級(Poghosyan 2003)。

亞美尼亞現代化轉型尚未結束，不過已經帶來了很大的變化。根據全國性的調查，我們分析以下的模型(Poghosyan 2005)：

- 上層階層：政治和經濟

菁英、大地主、寡頭(總人口5%-7%)。

- 中產階層：小資產階級、企業家、高薪專業人員、公職或是管理階層(10%-12%)

- 大眾階層：辦公室人員、服務業、農民、知識從業員、製造商、領取福利補助者，暫時性失業(65%)。

- 社會底層：遊民、失業者、性工作者、社會淘汰者(15%)。

亞美尼亞社會已經分為好幾個階層，根據不同的生活水準而劃分。社會人口的邊緣化已經開始，這是失業所造成的結果。我這裡所謂的新貧階級，就是那些受到經濟轉型影響的人，而不是社會文化所帶來的結果。很多新貧人口是在共產時期見不到的。

此外，這裡的新貧和第三世界的貧窮人口意義也不一樣。第三世界指的是因為不識字、不幸意外

、高嬰兒死亡率、公共衛生不良所造成的現象。這裡的新貧影響到的人擁有高學歷和好的保險，是那些過去過得不錯的知識階層、勞工、領取社會福利和家管等。相同的現象現在在其他的歐洲國家和美國也都可以看得到，導因於金融危機。

傳統解決第三世界貧窮現象的對策並不適用於解決新貧問題。我們需要新的概念和方法來處理它，那就是要納入族群文化的面向。亞美尼亞有自己的經濟活動、有一批受過教育的人口和離散(Diaspora)亞美尼亞人投資的能力，因此，出路可能就在中小企業。 ■

References

Poghosyan, G. 2003. *Armenian Society in Transformation*. Yerevan, Armenia: Lusabats [Russian].

_____. 2005. *Current Armenian Society: Peculiarities of Transformation*. Moscow, Academia [Russian].

> 生氣蓬勃的 Current Sociology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國, 出版副會長(2010-2014)和Eloisa Martín,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Current Sociology主編

早期Current Sociology的研究趨勢報告，至今仍廣泛被徵引。

Current Sociology是一份出版很長一段時間的刊物，今年是60週年，其發展反映了從1950年代開始的全球社會學變遷。ISA成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底下，所以這個期刊也是聯合國的刊物之一。Tom Bottomore在1975年擔任執行秘書時是主編(1973年的主編Margaret Archer是第一位沒有擔任ISA行政職的主編)。早期的主要任務是促進各國之間社會學的溝通和交流，以近期出版刊物的參考書目為主要內容。那時的社會學還很小，這樣的目標尚可達到。那時的標題還有類似「未發展和原始社會的社會學」的字眼，顯示出當時聯合國行動的優先順序，現在則是比較觀點，把世界區分成「工業化」和「未工業化」。

後來刊物的走向很快



就從特定領域的參考文獻演變成研究趨勢的報導，且都由當時首屈一指的社會學家執筆。這是很有價值的資源。最著名的或許是S. M. Miller在1960年代寫的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比較了當時的相關研究，並做出結論。Google Scholar顯示它有253筆引用，有幾筆還是最近才引用的。

1963年的刊物介紹了研究委員會的成員，那時第一個成立的是家庭社會學。1990年這成為了另外一個獨立的類別，稱做Current Sociology Monographs。在早期，某幾期的主題只限定在特定的地理區域，雖然從題目中我們有時也很難判斷是某個國家特有的主題，或是只是某些主題中提到了特定的國家而已。後來某幾期則是回顧了特定國家區域的社會學研究，像是Scandinavian Sociology (1977)，和Anglo-Canadian Sociology (1986)等等。到了1997年，成員認為研究趨勢介紹已經不再能夠滿足大家的需要，因為已經

有很多其他的刊物可以取代。在Susan McDaniel當主編時，把刊物重新出版，成為了典型的同儕審查的期刊，聚焦在新的研究發展與爭辯上；不過同時還是有做研究趨勢的回顧，重點在於某個特定的概念、方法、理論等，也處理更大範圍的國際議題。

Dennis Smith繼續了Susan的先驅性任務，在擔任2002-2010年的主編時大刀闊斧將刊物變得煥然一新，更符合學術界的期待。同時也被ISI收錄，排名相當前面。此外，由於他可以看出潛藏在文章底下的社會學基本問題，所以他為期刊開創出了一個可以相互辯論的空間。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他讓作者與批評者在不同的議題上可以分別進行對話。

Current Sociology向來只接受ISA的官方語言：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但由於出版委員會的推動，現在接受任何的語言，只要作者不熟悉上述三種語言的情況下即可。這提

供了機會給那些所謂的邊陲國家的研究者可以和全世界的讀者發表和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2010年Eloísa Martín接下了主編一職，這是首次由非英語母語的人擔任此一職位，也是非核心學術機構學者的頭一遭。這反映出了ISA成員組成的變化，代表了更多國家的參與，也為這份期刊帶來了新的挑戰。

現今全球的大學都面臨到同樣的情況：出版，否則淘汰(publish or perish)。資源、計畫、名聲等都取決於學者出版文章的數目，以及出版期刊的排名。儘管在這樣的脈絡底下，Current Sociology還是要提供比較傳統的學術對話平台，交換意見，彼此仔細閱讀同儕的作品。透過這樣的對話，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以全球性的社會學視野，找出我們各自地方性的實在。■

> 全球化教室

by Larissa Titarenko, Belarus State University, Minsk, Belarus, and Craig B. Littl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Cortland, 美國



Larissa Titarenko教授和創意網路教學中心工程師Craig Little

新型態的知識社會是以網路通訊科技為基礎(ICTs)。雖然網路通訊科技讓世界變得更複雜，但也製造出了更多機會。以教育為例，網路科技就讓我們可以把書本傳送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並且可以在網路上教學。在公共領域，資訊可以透過論壇和社會網絡而傳遞開來，完全不受地理的限制。

虛擬教室的學生雖然說在物理空間上是分處各地，但是象徵意義上他們是連結在一起的，一起參與活動、學習、並討論。和傳統的教室不同，網路教室讓學生可以在任何時間進出教室，彼此還是感覺一起在上課，一起分享。

> 線上共同學習

以往網路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傳統的一如何找資料、使用資料、或是有效率的使用。不過，透過遠距教學，特別是社會科學，學生們可以更容易的參與學習，而不

受到物理空間的限制。遠距教學讓來自不同國家、城市、鄉鎮等的學生可以一起學習，就好像是一同進到一間教室裡面上課一樣。所以，虛擬教室雖然是肉眼看不見的，但卻是相當真實。學生透過彼此一起討論、辯論、聯絡等等，可以一起建立連帶感，彼此相互打氣。

在傳統教室和虛擬教室中，兩者都是由老師和學生一起建構知識。在虛擬教室中，學生感覺就像是鑲嵌在整個學習過程中，並透過表達意見、知識交換，知識變成個體的，甚至是互為主體。他們不只從書本上習得知識，還從與人互動中獲取知識。也因為他們不是近距離的看到老師，他們更加獨立，更能自在地表達自我。

因此，網路科技的優點之一就是若當我們把它應用在高等教育中，我們可以建構一個由全球各地教授和學生一起形成的學習分工與環境。虛擬教室可以讓不同國家、不同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透過溝通而一起學習。虛擬教室鼓勵學生參與對話討論。他們也要做作業(通常是要求彼此檢查作業)，並且透過學習管理系統(LMS)上傳。線上教學的形式，學生的負擔其實不輕，不過透過自由、自主的學習方式，可以刺激學生的動機和興趣。對於老師來說，讓學生可以與世界各地的同學一起切磋，是一個非常棒的回饋。線上對話是典型的作業之一，但恐怕也是最有趣的。因為學生在這個意義上是全球知識公民的一員。

我們有10年遠距教學的經驗，總共舉辦過6次，得到的回饋非常正面，遠遠超出我們在紐約州立大學(SUNY Cortland)傳統教室的經驗。我們虛擬教室的兩位老師：Craig Little教授(美國)和Larissa Titarenko教授(白俄羅斯)，他們在2001年於保加利亞的聯合大學民主會議(AUDEM)第一次見面，我們都對於在會議中

>>

展現的網路科技感到印象深刻。於是馬上就決定展開合作，舉辦遠距教學，以加大我們學校社會學學生的視野，特別是在跨文化溝通和比較方法上。每次上課有18-25人，多數是社會學學生。參與的大學主要有3所，包括Moscow State University (Dr. Mira Bergelson) 和來自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澳洲) 的學生，Craig Little教授則參與過早期的教學。¹

> 學習成為全球公民

因此，當我們提到虛擬教室的時候，通常指的是包括來自兩到三個國家以上的師生所組成。在我們的例子中，是由美國、白俄羅斯、澳洲、俄羅斯。大約三分之二的學生其母語是英文。最有挑戰性的是來自白俄羅斯的。他們要面臨的挑戰來自於下列三者：用英文上課，用不熟悉的網路科技，以及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方式。他們也通常沒有出過國，所以，例如要學習某個國家的青少年文化，那是完全陌生的。不過，美國和澳洲學生也通常沒到過後共產主義的國家(倒是很多人到過歐洲)，所以他們也能從中收穫不少。

虛擬教室和遠距教學上學生透過特定的教材、線上的課程、以及作業而進行學習。學生帶領的討論課由學生問問題，討論正在全世界發生中的大事，透過這樣他們學習到外國文化、歷史背景，以及各式各樣的方法。

我們進行這樣的教學模式已經好幾次了，經驗都很成功。學期末學生都肯定自己學到了很多，特別是透過線上以及個人的聯絡管道，讓他們交流很頻繁。從他們的教學評鑑反應中可以知道，他們很滿意可以得到其他國家的第一手消息，也可以自由地問問題，而且在課程結束後不會感到壓力，例如時間的、老師的、或是疏於討論所導致的壓力。²

> 激發學生

我們的教育哲學是來自Dewey的以學習者為主體的理念。我們鼓勵學生去討論很多實際案例，像是地方的法律執行、犯罪案件、刑罰、權利侵犯等等。通常他們也都討論「假如」的假設性問題，去理解為什麼在某個國家會使用某種方式。目的不在於要他們找出最好的辦法，而是要透過討論，去比較各種方式的異同。舉例而言，他們會學習到俄國、美國、澳洲、瑞典的刑罰，透過統計資料去看他們的累犯率等；此外也學習到三種歷史的社會控制模式：前現代、現代、後現代。每個學生都要求讀完三本教科書，定期

寫作業，參與課程，帶領討論。整個平台原本是SUNY的「學習網絡」所提供，現在則是SUNY Cortland的線上學習管理系統。

我們相信對所有學生來說，這是個很特別的經驗，而且對白俄羅斯的學生而言可能意義更為重大。因為他們在經濟與政治條件極差的情況下，又只有很有限的英語學習資源，能夠有機會可以參與西方的課程，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真的很難得。我們由衷相信我們可以跨越核心和邊陲之間的鴻溝，鼓勵學生在平等的基礎上討論和學習知識。以東西差異的二分法來看，我們也希望學生可以超越這種刻板印象。我們雖然用西方的教科書，但是也會用白俄羅斯的教材和其他國家的資源。學生可以從地方和理論去提出論證。在這個意義上，學生透過網路和合作去學習人權與民主。

總之，我們的線上學習與虛擬教室的經驗讓我們發覺網路通訊科技在教育上的無窮潛力，對於那些在國際間被政治孤立的國家特別是如此。這是一個學習知識的管道，也是累積人力資本的好方式。■

1 請見Craig B. Little, Larissa Titarenko and Mira Bergelson (2005), "Creating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Distance Learning Classroom." *Teaching Sociology* 33(4): 355-370.

2 關於網路遠距教學的有用資源，請見 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IL) 網站: <http://coilcenter.purchase.edu>. 若有進一步的問題請聯絡 Craig Little: Craig.Little@cortland.edu

> 國家學會的不平等待遇： 我們要改變 ISA選舉制度

by Roberto Cipriani, University Roma Tre, 義大利, 歐洲社會學會於ISA國家學會的代表會長

2002年在Brisbane的ISA世界大會跨出了歷史性的一大步，那就是決定選出國家學會副主席。但是程序規則卻有些急就章，因為那時候想做的就是趕快產生這樣一個職位而已。當初並沒有把選舉訂在下一屆於Durban的大會，反而是馬上選出印度籍的Sujata Patel為第一任副會長(接下來2006則是在Durban選出代表美國的英國籍Michael Burawoy和2010於Gothenburg選出的南非籍Tina Uys)，這些社會學家表現都相當稱職且傑出。

這些選舉是奠基在一個較為廣大選舉人的基礎上產生的，那就是Assembly of Councils其包括了由國家學會代表所組成的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CNA)以及由研究委員會所組成的Research Council (RC)。兩者的人數一樣多，都是55位選舉代表。不過到了後來真正進行投票時，後者的人數變多了，因此有點失衡。所以我們以下將各界的組成人數列出：2010 Gothenburg (43CNA + 47RC)；2006 Durban (35CNA + 45RC)；2002 Brisbane (30CNA + 44RC)；1998 Montreal (38CNA + 41RC)；1994 Bielefeld (43CNA + 46RC)。由此可見，研究委員會擁有決定性的多數可以選出國家學會副會長，反而是國家

學會的在選舉上是比較不利的。

再者，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兩次世界大會的間隔中，我們會換掉副會長至少一次以上，可是研究委員會副會長的任期相對穩定，因為是4年。這讓研究委員會可以有比較長的時間熟悉彼此，進行交流，增強連帶，促進合作。同時，國家學會卻會變動，定期會議的參與成員和世界大會選舉時的成員居然是兩批不一樣的人。

因為上述諸多原因，選出的國家學會副會長會即使是用來代表國家學會，不過也受到研究委員會的支持。所以結果就是這個職位實際上不只代表國家學會，也代表研究委員會的支持。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讓國家學會會員參與國家學會副會長的選舉，讓研究委員會排除在此選舉之外。國際社會學會向來一貫就是讓所有代表可以選出會長和其他三位副會長(財物、出版、計畫)，那麼改變國家學會和研究委員會的副會長選舉制度是特別有用的。■

> 介紹日本編輯團隊

在此我們介紹充滿活力日本全球對話編輯團隊。

我們日本團隊很高興可以有機會向全世界的讀者作自我介紹。在此我們想要謝謝Michael Burawoy以及其他的編輯們，謝謝你們跟大家分享寶貴的經驗與看法。我們歡迎大家來參加2014年於橫濱舉辦的世界大會，以及我們如何重新復甦日本。



芝真里 (Editor in Chief) 是Boston University的教育碩士，並在Boston有教育多元背景小孩的經驗。她現在是名古屋大學的博士生，同時也是RC31 (遷移社會學)的會員。研究興趣主要是美國和瑞典的國際收養現象。



岩館豐是東京一橋大學社會科學博士生。他開始從事田野調查，企圖去研究年輕勞工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建構社會空間。



西原和久(Editorial Supervisor)是名古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也是日本社會理論學會的會長，專長是社會學理論，特別是以現象學方法研究全球化和跨國主義。現在主要研究東亞的遷移現象，特別是日本的外國農民。



三部倫子畢業於京都大學的外語系，現在是御茶水女子大學的博士候選人。她也是這裡的社會科學碩士。她研究日本的性少數和其與父母之間的關係。



福田雄是關西學院大學的社會學博士生，專長是宗教社會學和集體記憶。他已經開始田野研究，去瞭解災難後的儀式，像是原子彈爆炸和地震發生後的紀念活動。



佐藤崇子從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的國際和平和西班牙語文系畢業，現在是北海道大學的博士生。她的研究是美國移民政策，以及非法移民的社會網絡。



姬野宏輔是東京大學的博士生，專長鄉村社會學，從事田野去保存在名古屋縣的小農村和文化。他很榮幸可以擔任全球對話的翻譯與編輯工作。



塩谷芳也是東北大學的博士生，專長為社會階層與不平等。最近他剛完成一份日本關東大地震的調查，分析受難者收到社會的援助以及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



池田和弘已經於2005年完成東京大學的博士修業課程現在是東京上智大學的博士後研究人員。他是國際研究計畫「比較氣候變遷的政治網絡」(COMPON)一員，也是RC24 (環境與社會)的成員。



高見具広是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生，也是日本促進科學學會的研究員。研究興趣是工人的自主性，特別是長工時的相關議題。

> John Rex過世，享年86歲

by Sally Tomlinson,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and Robert Moor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英國



John Rex：社會理論和種族關係的先驅。

John Rex在2011年12月18日過世了。他的熱情、活力、智識，將社會學帶上新的顛峰，讓人們很難忘記。John Rex在南非的Port Elizabeth出生，18歲時在二戰期間於英國皇家海軍服役。戰後回到南非，目睹種族隔離的不公不義，所以在他轉念社會學和哲學之前，他是主修神學的。他在Rhodesia的一所學校教書，直到後來被驅逐出境——因為他支持反種族隔離運動。後來John Rex在Leeds University拿到博士，並在該校教書。1962年，他轉到Birmingham University，接著1964到Durham University、1970到Warwick University。他是這兩間學校社會系的創始者。1979-1984年，他在Aston Uni-

versity擔任社會學研究與種族關係中心的主任。除了到Toronto、Cape Town、New York等大學客座訪問之外，其餘時間他都在Warwick University教書，直到退休。晚年則病痛纏身。

John對社會學有極大熱情，後來出版了Key Problem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1964)，讓讀者可以超出Parsons的視野，多接近古典社會學的作品。他的思考圍繞在Marx、Durkheim、Simmel、特別是Max Weber上。他重新喚起了大家對於衝突理論的興趣，認為價值和利益的衝突是一種社會規範，其1981年出版了著作Social Conflict。John也對權力的社會運作理解得很透徹，且曾經有機會成為工黨的國會議員，不過他認為分析政治與社會才是學者的工作，從政並非選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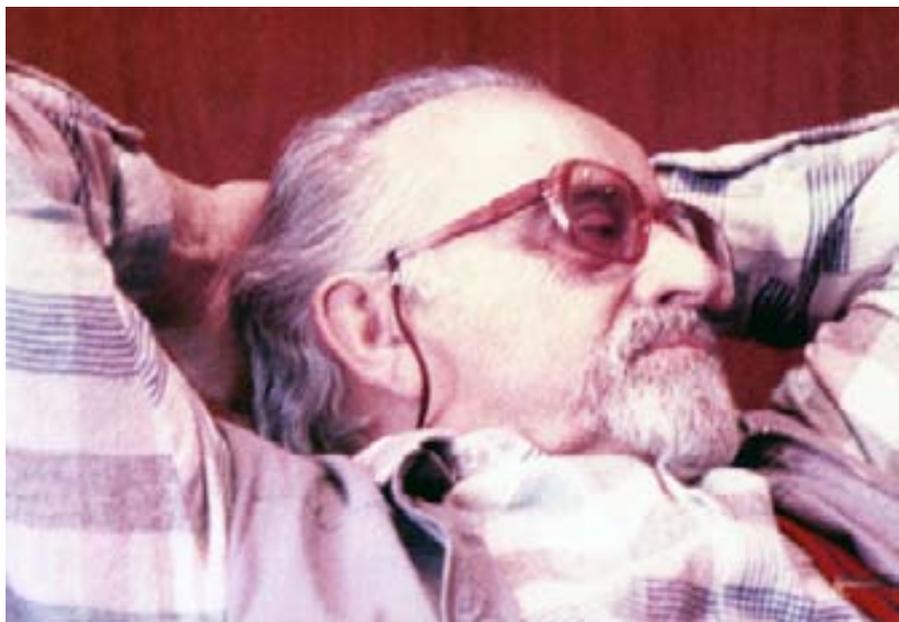
他對科學的熱情絲毫不影響他對種族主義的厭惡，特別是1950年代針對剛到英國的第一代移民的種族主義。他也是UNESCO的種族與正義的國際專家委員會的委員。1967發表了一個聲明，清楚指出「所為的種族問題是社會所造成的，而非生物性的。」，這在當時是非常激進的看法！他在ISA的種族關係委員會擔任了8年的會長。1964他和Robert Moore在Sparkbrook (Birmingham)

展開研究，後來發表了最著名的著作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Rex and Moore, 1967)，後來1974回到Handsworth, Birmingham又出版了另一本書：Colonial Immigrants in a British City: a Class Analysis (Rex and Tomlinson, 1979)。

John Rex對於他的論證非常堅定且不輕易妥協，因此他觸怒了幾個與其一件相左的同事，而且他也喜歡挑戰那些他覺得膚淺的看法。不過，他的看法始終受到尊敬。他過世後，來自他以前學生和同事的弔唁非常多，都說「他改變了我」。其桃李滿天下，遍及世界各地。生前他最後的著作是一篇論及1970年代Birmingham的社會學教授 Wilhelm Baldamus的文章，他這麼說「Baldamus是個特別的人，不攀附在主流的學界思想；他在面對同事和朋友的時候也仍然是堅持己見，不會逢迎附和。」這段話其實也可以用來描述他自己。2010年他從英國社會學會得到了終身成就獎。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會忘了他的。■

> 追思Kurt Jonassohn 1920-2011

by Céline Saint-Pierre, University of Quebec in Montreal, ISA 執行秘書, (1974-1979), ISA 執行委員 (1986-1990)



Kurt Jonassohn：堅定的ISA貢獻者。

1974年，我和Kurt Jonassohn同時被選為ISA的執行秘書，Tom Bottomore是當時的會長。秘書處當時要從Milan移到University of Quebec in Montreal (UQAM)，也就是我任教地方。Kurt是University of Concordia的教授。後來我們共事合作了五年之久(1974-1979)，後來他和Marcel Rafie繼續擔任秘書一職。Rafie也是UQAM的社會學教授。最後秘書處移到Amsterdam (1983)才結束。

Kurt雖然在加拿大Montreal的英語學術社群有很好的職位，不過他也說了一口流利的法語。我們平常的工作交談都用法語進行，而且是他堅持要這麼做的。他對Quebec的法語

文化非常敏銳與熟悉，讓我好生敬佩。也因此，他對於當時以英語為主流的ISA中法語地位的提升有著很大的影響。

我們兩人都對財務等事物不感興趣，然而Kurt後來很慷慨地接受了財務主管一職。當時ISA的財務狀況並不佳，所以這很不容易。收入來自個人和團體會員，可是還是不夠，1974年在Toronto的世界大會還是赤字的。Kurt小心謹慎地和執行委員會處理這些事情。而到了我們第一任結束時，財務卻反虧為營。總之，不論財務狀況為何，Kurt始終如一，誠實地承擔起這個重責大任。

Kurt Jonassohn也在對於ISA的歷史認識上，做

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藉由19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期刊，並訪問了ISA之前的會長，成為了1998年Jennifer Platt出版的A Brief History of the ISA: 1948-1997一書的主要材料。

在卸任之後，他還是和ISA一起合作共事了好幾年。同時他也繼續教書和研究。其生涯最高峰的著作是與Frank Chalk共同創立的Montreal Institute for Genocide Studies (1986)。Kurt Jonassohn於1920年8月31日生於德國Cologne，於2011年12月1日過世於Montreal。■

> 哥倫比亞社會學的承襲與斷裂

by Patricia S. Jaramillo Guerra with Fernando Cubid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 at Bogota



社會學是玩真的！年輕的哥倫比亞社會學者參加Cali於2011年11月2-4日的全國會議。

2011年11月2-4日，在哥倫比亞的Cali舉辦了哥倫比亞的全國社會學會議，主題社會學的承襲與斷裂。主辦者是由Universidad del Valle，Universidad ICESI，和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的社會系所負責。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會議開始之前的暖場會議是聚焦在

Weber的思想。

這次會議的成功對於我們社會學的鞏固相當重要，因為上一次舉辦大會是在2006年。雖然說哥倫比亞社會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不過由於社會學宣稱與游擊隊有關係，在這個被視為暴

力的脈絡下，許多社會系被關掉了，直到最近的5-10年，才有社會系陸陸續續重新成立。

從內容來看，哥倫比亞的社會學是由社會的許多衝突矛盾所形塑而成。例如暴力與民主的共存，拉美最嚴重的不平等，同時又擁有拉美其他國家所罕見的法制化的社會與文化權利。哥倫比亞為社會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實驗環境，相對的，社會學也被要求負起更多的責任。

Weber會前會議是由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社會系和其他主辦本屆會議的社會系所籌畫的，目的是要討論Weber思想在最近的轉變，邀請到許多知名的學者，包括Wolfgang Schluchter (德國)，Francisco Gil Villegas (墨西哥)，Esteban Vernik (阿根廷)，Javier Rodríguez Martínez和José Almaraz Pestana (西班牙)。與會者都強調了不論是學者或是公眾，重新閱讀Weber都有其重要性在。國內和國際的學者都提到如此閱讀古典作品是很少見的，所以也充分反映了哥倫比亞社會學的現狀。

我們邀請到了很多知名的學者，如ISA President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拉美社會學會(ALAS)會長Henrique Martins (Federal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巴西)，Alejandro Portes (Princeton University的移民與發展中心主任，美國)，Emilio Tenti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an-

tiago，智利)，Milton Vidal (University Academy of Christian Humanism，智利)。他們都是在當代不論全球社會學、公共社會學、移民、後殖民研究辯論中很知名的人物。

會議算是空前的成功。24個工作場次，600名與會者，200篇文章，11位國際貴賓，以及從Colombian Network of Sociology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RECFADES)來的15個社會學相關單位。大會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和大會的閉幕主題相互輝映：「社會學很蓬勃」和「社會學就如同其他科學一樣有正當性」。

工作場次的氣氛也顯示了哥倫比亞社會學的生氣勃勃，由有越來越多的師生反對全球貿易這點可以清楚看到。另一個值得提的是許多的社會系畢業生都到其他領域做出貢獻；我們也看到這個學科充滿多元性，像是新的主體概念和非傳統研究性別的方法，以及新的方法研究各種主題。過去不怎麼受歡迎的主題如今也熱門起來，特別是從品味、風格、藝術表達的觀點去看待消費。此外當然也有傳統的社會學題目：暴力、農民運動、勞工組織、農村社區等，這些領域還是相當活躍。

會議受到熱情的掌聲，我想不單單是籌辦者的用心與高超的技術讓這場學術會議如此成功，還因為他們展現了墨西哥城市所特有的慷慨、好客與熱情。 ■

> 歐亞的土耳其社會學

by Elena Zdravomyslova, European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ISA執委(2010-2014)



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的首都Ufa
舉辦了第四屆土耳其社會學大會

2011年9月4-6日，從俄羅斯、歐洲國家、土耳其、哈薩克、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國而來的知名社會學者到Ufa參加土耳其社會學世界大會。主題是：「歐亞空間：21世紀俄羅斯地區和土耳其語國家的文明化潛力」。上一屆是在2005年由土耳其舉辦，後來陸續於哈薩克和吉

爾吉斯辦了多次會議。

Ufa是位於南Urals的一個美麗宜人的城市，人口有上百萬人。它是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一個位於於俄羅斯聯邦自治區的國家——的首都。另外它也是多族群的地區，其中巴什科是僅次於俄羅斯的第二大族群。巴什科語屬於土耳其語系，其憲法規定了俄羅斯與和巴什科語

>>

為官方語言。然而，說巴什科語的人很少，即使最近政治上越來越想推動這個語言，不過還是快要銷聲匿跡了。

俄羅斯的社會學者會彼此相互溝通交流。這次巴什科社會學會(也是俄羅斯社會學會的集體會員之一)舉辦了這場有超過200人參加的大會。政府很支持這次活動，並提供財務與組織上的資源。總統發言人負責開幕演講。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場合由以下的一些單位負責：Bashkir Academy of Sciences會長、土耳其社會學元老副會長、俄羅斯社會學發言人、亞塞拜然的副會長，以及ISA的代表：我。俄羅斯語和土耳其語是會議中最普遍的交談語言，現場也提供同步翻譯。

論文聚焦在歐亞，包括歐亞的空間、文明、歷史、共同面對的問題，以及未來展望。由土耳其社會元老組織的社會學家Ercal Mustafa認為，這次會議的重點是去概念化世界上各種分化的現象，以支持各個地區的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主題演講題目是關於歐亞文明化的多重認同，這是由俄羅斯的社會學家L. Gumilev所提出的。他們把焦點放在社會與歷史發展的土耳其典範上，還有跨國認同的強化以及土耳其世界的全球整合。

論文主要圍繞在歐亞主義和土耳其與俄羅斯世界中社會問題和社會科學的關係。四個場次分別是：「歐亞主義：科學研究的問題與前景」，「當代歐亞的社會動態：問題與解答」，「歐亞空間的文化面向」，「土耳其和俄羅斯的社會學」。此外一個重大的進展是將要發行*The Eurasian Sociological Journal*。

另外這些國家也採取了很多合作行動，像是建立跨區域和跨國連結、大學之

間師生的交換，增加共同研究和翻譯計畫的合作機會等等，這些都可以把不同國家的社會學家串起來。此外，會議的另一個重點是增加巴什科社會學會的重要性。巴什科社會學會將在2012年10月舉辦全俄羅斯地區的社會學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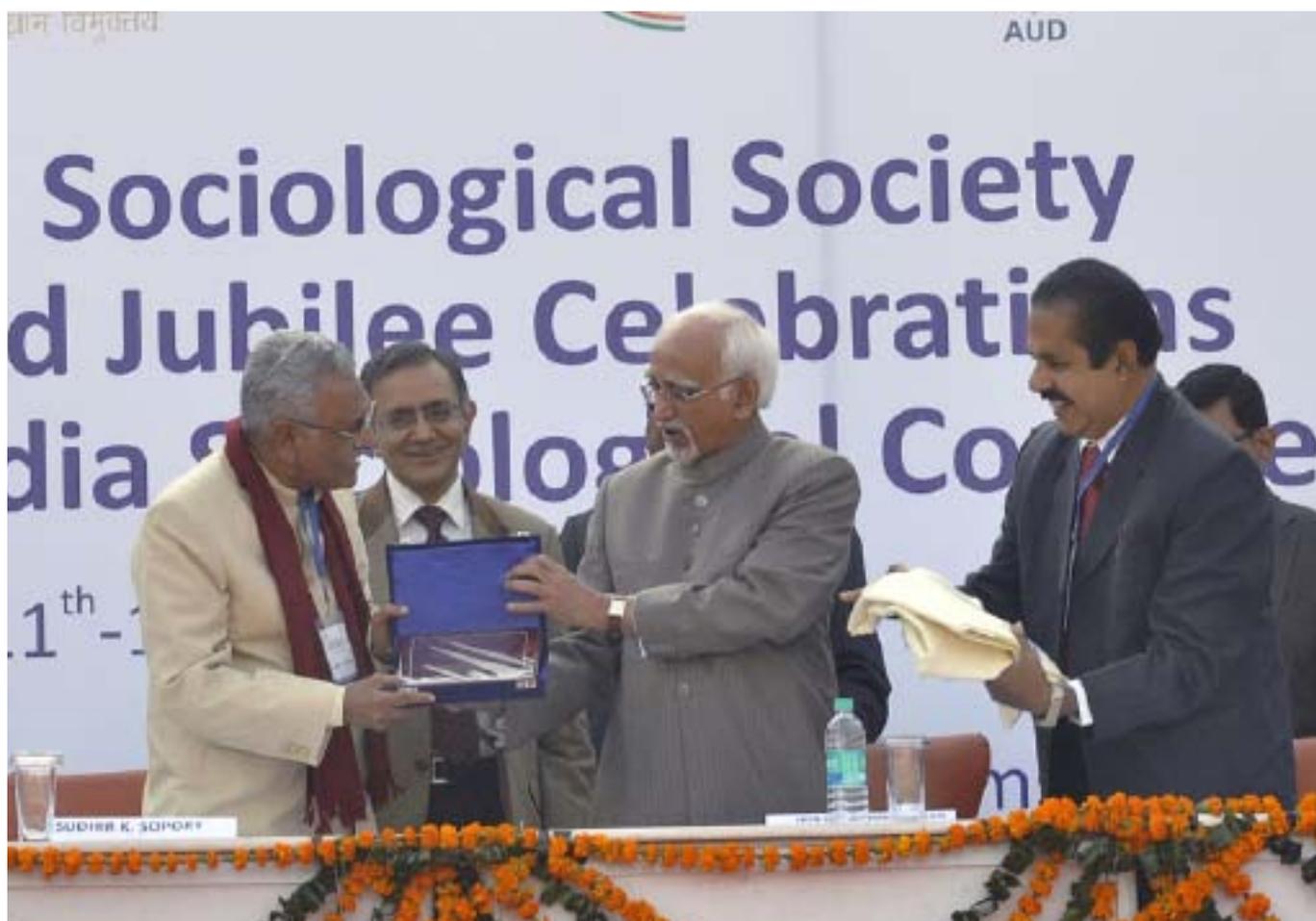
會員大會中也起草和通過了許多提案，像是促進土耳其語國家的社會學合作，促進俄羅斯和土耳其社會學家的交流，土耳其代表和Ufa大學同意彼此交換師生。而在宴會時社會學家彼此交換禮物也象徵了他們彼此之間的文化連帶。

大會為巴什科社會學會的創始者Nariman Aitov (1925-1999)製作了紀念牌。他是第一代的蘇聯社會學家，1964在Ufa成立的社會學實驗室。他在區域規劃、社會工程、社會流動、以及科技革命的社會影響等領域有著很大的貢獻。此外他著作等身，發表過300篇的文章或書籍。2000年Academy of Sciences of Bashkortostan設立了Aitov Award，獎勵傑出發表著作。

總之，此次會議代表的是土耳其語國家的社會學者之間文化與學術的密切交流合作，正式跨國之間的社會學多元性格。不令人意外的是土耳其來的社會學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蘇聯解體之後，中亞就是個獨立的地域了。北北高加索和俄羅斯東部還有為數不少的人說土耳其語。然而整合所需要的不只是語言的相似性，而還需要有共同的中亞共同文明的理念。因此，歷史根源、現代化路徑、集體記憶、文化傳統等都是社會整合所需要的智識資源。如同其中一位大會組織者所言：雖然土耳其語的國家已經彼此分家了數千年了，不過現在還是可以在學術和文化上攜手合作。■

> 印度社會學的60週年大會

by T. K. Oommen,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New Delhi, 印度, 印度社會學會組織委員會會長, 前ISA會長(1990-1994)



60週年大會於2011年12月11-13日，在New Delhi的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JNU)舉行，由社會系統研究中心(CSSS)主辦。此中心是JNU裡面一個很傑出的社會學單位。本會議的組織秘書長Anand Kumar就是CSSS的教授。

印度社會學會(ISS)每年舉辦會議，每次的會議結構有三的組成部分：全體

出席場次(開幕、閉幕、兩個紀念演講)，工作坊以平行的方式進行，24個研究委員會(RCs)分別會有會議。會前會和會後會的場次則在不同的成是舉辦。近幾年年輕社會學家的會議也會安排在會前舉辦。會前會議和會後會議也都很重要，這次在Bombay和Lucknow舉辦，這兩個地方都是社會學教學與研究的重鎮。

T. K. Oommen教授因為擔任過印度社會學會會長而受到副總統Shri M. Hamid Ansari的表揚。副大臣Sudhir Kumar Sopory站在中間，ISS會長Jacob John Kattakayam則在右邊觀看。

這次開幕由學者出身的印度副總統Hamid Ansari做開幕致詞，認為社會學在解決當代我們所正面臨的危機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在這個脈絡下其實正突顯出了公共社會學的意義。ISS的會長J. J. Kattakayam則以這次會議主題「社會學和印度社會轉型」演講。

開幕場次頒發傑出榮譽給傑出的印度社會學家。總共3人：S. K. Srivastava (Benares Hindu University)，P. K. B Nayar (Kerala University)，J. P. S. Uberoi (Delhi University)，他們都得到終身成就獎。以印度尊敬長者的傳統為基礎，所有的前ISS會長都會受頒此一榮譽。

5個工作坊的主題分別是：「社會學和社會轉型的危機—全球觀點」，「治理危機」，「極端主義的危機」，「發展危機和邊緣化」，「Delhi的社會和社會學」。第一個工作坊是全球性的，最後一個有在地意義，其他三個則以印度為主，如此和蓋了全球、國家、地方三個層次。我不會對這些場次做

評價，但我會用報導的方式介紹它們給國際讀者認識。而另外有來自國外的4位講者，分別來自美國、瑞典、德國、日本。Michael Burawoy的這場我是主持人，他強調了以社會運動去瞭解現在社會變遷的重要性，既是是病徵，也同時是解藥。我則強調社會學和社會轉型危機兩者不可分割的角色。其三3位則主要談他們國家的問題。

為了反映印度社會學的多元性，兩場紀念演講主題分別是「社會流動和社會結構—概念與方法的重構」(the M. N. Srinivas memorial lecture)，由P. N. Mukherjee教授擔綱講者；「從理念型到隱喻—重新檢視革命的概念」(the Radhakamal Mukerjee memorial lecture)，講者是D. N. Dhanagare教授。他們倆會都是ISS的前會長。相對年輕的Dipankar Gupta教授則是負責閉幕演講，題目是：「進行治理：公民、成長、發展」。

論文摘要手冊總共收錄了775則摘要，來自22個研

究委員會。其中最大宗是由兩個委員會來的：「鄉村、農民、部落社會」和「社會」變遷和發展」。最少數的來自「教育、社會、理論」和「概念與方法」研究委員會。這或許反映了印度社會學的走向。

此外，ISS的期刊*Sociological Bulletin*發行了特刊，收錄兩篇大型的研究論文。第一是A. M. Shah教授等人所寫的關於ISS歷史的論文，以及另外由主編N. Jayaram所寫關於*Sociological Bulletin*五十年歷史的論文。另外，Sage Publishers出版了7冊*Sociological Bulletin*的論文集，其中6冊分別處理不同主題：印度社會學、變遷中的卡斯特、農業變遷、以及關於邊緣族群、教育、社會運動的主題。第7冊則節選了過去的會長演講。

這次大會總共1500人參與。這篇簡短的描述或許可以給其他國家作為一個比較的基準。最重要的是要讓印度社會學家知道印度社會學已經走過了多少的歲月。■

> 金磚四國的社會階層

by Tom Dwyer, University of Campinas巴西, ISA執委(2010-2014)



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的社會學家在北京齊聚一堂討論各國的社會階層化議題。

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因為改變了全球秩序地景，所以很快地受到矚目。為了進一步瞭解這個過程和各國內部的社會階層，2011年的10月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討論李培林新編的書：「金磚國家社會分層：變遷與比較」。此書試著想要知道是什麼樣的因素讓這些國家整合與分離。

一開始稱呼這些國家為金磚四國的原因是它們土地大(超過3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多(超過1.5億)，以及擁有高成長率的發展經濟。這些論文不但讓我們瞭解這三個因素在經驗可檢證的層次上對於經濟政治的影響，還增進我們的知識。於這四國明顯地都存在地域的不平等很。因此，透過比較這些發展國家，找到相對多數的農業人口，農業人口的不平等遠大於都市，以及公職人員和政治人物所擁有的財富資源不成比例地高而也形成所謂新的中產階級。當我們檢視這本書許多細節時會發現某些共同的社會動態：例如，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取得教育資源，但是很多結構性的不平等依舊存在。此外，這四個國家的經濟成

長沒有一個是因為現代化而產生的，因此，這告訴了我們這裡有些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理論意涵存在。

上述諸多的相似處帶來了相同的反應，也認識到主流歐美社會階層理論在實際應用於四國經驗時的落差。我們之所以質疑傳統社會階層化理論的觀點在此的適用性，因為我們看到的是高度的社會流動，以及專業生活概念的結束。我們也說明了能動性概念的缺乏使得我們很難去解釋認同形塑和社會變遷。所以，為了要讓四國的比較更有意義，我們認為有必要去更進一步認識國家的統計資料，看看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國家是如何不同。

當我們在辨識金磚四國的差異時，我們可以知道，差異以及差異所導致對社會政治行動的結果，會因為四國彼此瞭解更多，而變得更清楚。瞭解差異，以及發展出共處的能力，我相信是建立一個共同未來的關鍵，也幫助我們去管理那些看似不可免得社會衝突。這裡也正是社會學(或人類學)研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之處。■